



吕进 主编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

吕进诗学研究

张德明 姚家育 ◎著



人民出版社

吕进诗学研究

张德明 姚家育 ◎著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陈晓燕

责任编辑:陈晓燕 卢 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进诗学研究/张德明,姚家育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吕进主编)

ISBN 978-7-01-016206-5

I. ①吕… II. ①张… ②姚… III. ①诗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0081 号

吕进诗学研究

LÜJIN SHIXUE YANJIU

张德明 姚家育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63 千字

ISBN 978-7-01-016206-5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

顾 问：黄蓉生 张卫国 崔延强 靳玉乐

主 编：吕 进

副主编：熊 辉

编 委：（按音序排列）

陈本益 段从学 江弱水 靳明全

蒋登科 李 震 梁笑梅 陆正兰

吕 进 王 珂 王 毅 向天渊

熊 辉 颜同林 张崇富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吕 进

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新诗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初期的现代诗学致力于爆破。现在回顾，这种爆破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没有爆破就难以拓出新路。然而这种爆破又是简单与粗放的，连同我们民族的传统诗学精华也成了爆破对象。这就给现代诗学留下了“先天不足”“漂移不定”“名不正言不顺”的缺陷。

百年来，现代诗学在艰难摸索中也有所建树，朱光潜和艾青的《诗论》至今为人关注，闻一多的一些见解至今也具有影响。在 20 世纪的新时期，出现了专业的诗评家队伍，他们成为力求建立属于新诗的诗学话语体系的主力军。由于没有在现代性地处理与传统诗学的承接、本土性地处理与西方诗学的借鉴上取得突破，现代诗学迄今仍缺乏严谨的学理性与体系性，这就使得新诗迄今仍缺乏诗美标准和文体规范。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诗走向“私语化”，大多数诗评家随之失语，诗人自己的随感式言说和圈子内自道部分地替代了学术话语。

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中国新诗至今依然立足未稳，新诗文体的合法性依然饱受质疑。有些知名诗人和学者公开表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艺术实验。有些知名政治家说，给他一百大洋，他也不看新诗。更多的知名新诗人，到了晚年都“勒马回缰写旧诗”去了。

近年写作旧体诗成为热潮，新诗进一步处于尴尬境地。新文学中的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在现代中国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唯独新诗的读者却几乎与新诗的写作者复合，新诗成为游离于时代、游离于社会生活、游离于学校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无人赏，自鼓掌”的边缘文体。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也必然应该是现代诗坛的主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里讲得对：“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旧体诗迄今依然有其生命力，以后也不会失去生命力，但是作为古汉语的诗歌，旧体诗用于抒写现代人的情愫在形式上会受到诸多局限：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多音词难以入诗；旧体诗的许多形式规范也只是古汉语的结晶。我们读外国人翻译的中国古诗词就可以发现，译者其实是放弃了古诗词的种种形式要素，将中国古诗词译成了中国新诗。

但是古诗所创造的中国诗歌传统，新诗却是必须继承的，它是中国诗歌的“身份证”。当然，这种继承是经过现代化过滤之后的继承，必须回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况，力求“旁观见审”，有所“健忘”。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讲过：“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省却了不少心力。”

绝对不能赋予诗的“现代形态”以超出诗的边界的权利。既然是诗，就得拥有诗的基本审美规范；既然是中国诗，就得遗传中国诗的审美密码。只有在变革中延续中国诗歌传统的新诗，才有可能受到中国读者的接纳和欢迎。

近年来，诗坛上有的“理论家”频频宣传新诗就是“自由”的文体，宣传忽略甚至放弃诗之为诗的文体要素，宣传忽视甚至放弃诗的文体可能，进一步将新诗推向困惑和无序的境地。什么“新诗就新在自由”“凡大众欢迎的就不是诗”，这类腔调实在应该偃旗息鼓了。

新诗需要生根，新诗需要发展，新诗需要繁荣，新诗需要像唐诗那样得到全民族的认可和喜爱。我们急需现代诗学，急需民族、现代、学理的现代诗学。加强现代诗学对传统诗学的现代性承传，加强现代诗学对西方诗学的本土性借鉴，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完整体系，是新诗的中国梦。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6月，迄今已经30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家专业的的新诗研究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30年来，研究所在诗学界独树一帜，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出影响，是国内外人所共知的现代诗学圣地。新诗研究所同仁在现代诗学本体论、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新诗发展史、歌词研究和新诗评论诸方面多向度地

展开研究工作，取得人所共知的成绩。

作为重庆市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笔者担任主任的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9月，迄今也已15年。中心下设中国新诗研究所（吕进、蒋登科、熊辉先后担任所长）、中国古诗研究所（所长刘明华）、比较诗学研究所（所长陈本益）和中国现代诗学典藏中心（主任李怡），而中国新诗研究所一直是诗学研究中心的基础和旗舰。

诚然，由于地域的原因，新诗研究所在全国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人们习惯性地更注意北京这种“中心地带”的声音，重庆一些文学新作的研讨会也要特地搬到北京举办，这种费时费力而又无效的做法就是“崇北”心理的典型反映。但是学术思想最终并不会以地域来划分正误，也不会以地域来衡评分量，这一点，以后将会由现代诗学的历史来证明，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我想起苏联时期的塔尔图大学（University of Tartu），这所大学地处爱沙尼亚，原来是一所偏僻地区的无名大学。后来那里出了新审美学派，出了新审美学派的主要学术带头人斯托洛维奇，塔尔图大学由此成为苏联在美学研究领域一所举足轻重的学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的创意出自中国新诗研究所熊辉所长、向天渊副所长和所务委员会团队，这是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一项纪念活动。丛书得以顺利问世，西南大学 and 人民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也是必要前提，谨在此致谢。

“不学诗，无以言”，中国是一个诗歌古国，也是一个诗歌大国。这个古国和大国的诗歌传统，如果在新诗这里中断，我们将愧对后人。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有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借用一下：不管世事怎么变幻，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已届而立之年的中国新诗研究所任重而道远，我愿意最衷心地献上我最美好的祝福。

目 录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001

绪 论 001

第一章 吕进诗学的理论渊源 004

第一节 异域诗学的影响 004

第二节 中国古典诗学的影响 018

第三节 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 029

第二章 吕进诗学的演进轨迹 046

第一节 酝酿与萌芽期 046

第二节 探索与实践期 049

第三节 独创与体系建构期 060

第四节 反思与完善期 076

第三章 吕进诗学体系的构成（上） 084

第一节 诗的定义 084

第二节 诗的形式 093

第三节 诗的结构 099

第四章 吕进诗学体系的构成（下） 107

第一节 诗的语言 107

第二节 诗的功能 115

第三节 诗的分类	122
第五章 吕进诗学的话语范式	129
第一节 诗家语	129
第二节 审美视点	138
第三节 弹性	144
第四节 媒介	150
第五节 文体	154
第六章 吕进诗学的话语特征	160
第一节 吕进诗学话语与中国传统诗话	160
第二节 以感悟为基础的诗性表述	163
第三节 象喻式批评的言说方式	165
第四节 类概念的范式策略	168
第五节 以少总多的学术笔法	171
第六节 辩证法的演绎逻辑	174
第七节 吕进诗学话语的当代意义	178
第七章 吕进与“新诗二次革命”论	182
第一节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基石	182
第二节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思维逻辑	187
第三节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当代诗学价值	189
第四节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可行性	193
第五节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诗学价值	196
第八章 吕进与新诗“三大重建”	198
第一节 新诗“三大重建”论的理论缘起	198
第二节 新诗“三大重建”论的诗学深意	202
第三节 新诗“三大重建”的内在逻辑关系	206
第四节 新诗“三大重建”论的当代诗学意义	209
第九章 吕进诗学的理论独创与学术贡献	212
第一节 对新时期诗歌的历史阐释与美学引导	212

第二节 对当代诗歌批评的突出贡献	222
第三节 传统文论现代转换的成功尝试	226
第四节 西方文论中国化的丰硕成果	230
参考文献	240
后 记	243
丛书后记	245

绪 论

以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组白话诗为起点，中国新诗迄今已走过了将近百年的风雨岁月，它的是非成败如何，又有着怎样的经验与教训，这些都值得人们好好地总结。与此同时，以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为开端，中国现代诗学也已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它有着怎样的理论成果，对新诗的创作和阅读起到了怎样的指导与启发作用，又有着多少原创性的学术含量，这些也需要系统爬梳与阐释。正是在梳理中国新诗与现代诗学的前行轨迹、总结其经验教训的学术思想指导下，我们选择了当代重要诗歌批评家吕进作为典型个案，通过阐释其诗学理论建构的系统性，发掘其诗学思想的原创性，概述其对中国现代诗学的主要贡献，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进行巡礼和检视，以便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东西，促进中国新诗和现代诗学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发展。

之所以选择吕进作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典型个案来加以探讨和阐释，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吕进诗学的发生与发展与新时期以来当代新诗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吕进进行诗歌批评实践和诗学理论建构的过程，正是中国新诗在“拨乱反正”以后，从过去的创作沉寂乃至美学荒漠中走出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收获了丰硕的创作成果的黄金岁月。作为有雄厚的理论积淀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力的诗评家，吕进不仅长期据守新时期诗歌的第一现场，对诗歌现象和诗歌文本加以深入细致的阐释与剖析，及时总结其创作得失，还以新时期诗歌为主要例案，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对吕进诗学加以阐述，既能从中探寻到新时期诗歌的演进路线，还能对新时期诗歌的美学特征和优劣之处有更为准确的认识。其二，吕进诗学是有鲜明的学理框架，有不可多得的体系性的。不能否认的是，当代不少诗评家都以学理深厚、批评锐利见长，他们往往能从诗歌现象中发现内在本质，在诗歌现场将当代新诗的诸多

外在表征与内在规律加以揭明。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不少诗评家常因过分粘滞于诗歌现场，只是着眼于描摹诗歌现象，追问其间存有的诗学问题，而没有往后退一步，越过诗歌现象去探究诗歌本体上的特征和规律，从而无法构建出诗学理论体系来。在当代诗评家序列中，吕进是有自己独特诗学体系的一位。他不仅对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发展历程进行了多方面描摹与诠释，还在诗歌的本体问题上，诸如诗的定义、诗的形式、诗的结构、诗的语言、诗的功能、诗的分类等有着细致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学术阐发，与此同时，他还创建了包括“诗家语”“审美视点”“弹性”“媒介”“文体”等诗学话语谱系，并拥有一套富于个性的独特话语言说方式。具有鲜明体系性特征的吕进诗学，由此成为中国现代诗学在新时期之后的重大收获。基于此，透彻理解吕进诗学也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诗学，对吕进诗学的研究自然就构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吕进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热情和强大的理论创造力，他不仅对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发展有着具体的记录、分析与阐释，还对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发展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与认知。新世纪以来，吕进积三十多年诗学研究之功力，在思考百年新诗的发展历史，同时又聚焦当下诗歌的现实情状等基础上，先后提出了新诗“二次革命”论和“三大重建”论，这对促进当代诗歌尽快振衰起弊、更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是功莫大焉的。研究吕进在新世纪以来的诗学创建，对于准确认识中国新诗而今仍存在的严重痼疾，希图为它的未来发展找到更有效方略等来说，都是极有意义的。

吕进从事新诗研究近四十载，述学颇丰，著作等身。他先后出版了《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给新诗爱好者》《一得诗话》《新诗文体学》《吕进诗论选》《中国现代诗学》《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现代诗歌文体论》《中国现代诗体论》等学术著作，主编了《新诗三百首》《新中国五十年诗选》《中国新时期“新来者”诗选》等重要诗歌选本，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诗学论文。2009年，四卷本《吕进文存》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套洋洋200余万字的“文存”集中了吕进2009年以前的主要诗学著述，构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的代表性著作。从这套文存中，我们是能大致勘探到吕进诗学体系的雏形的。

对吕进诗学加以具体审视时，我们注重紧扣他的诗学文本来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一方面，我们力图从吕进的主要诗学著作和诗论文章中，提炼其

对诗歌本体问题的阐释要点,描述其诗学理论体系的细部纹理;另一方面,以吕进的理论建树为起点,探微发幽,追根溯源,打探其诗学理论的来龙去脉,揭示吕进诗学与中西方诗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总结吕进诗学的原创性理论因素以及他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独特贡献,对吕进诗学的理论价值加以充分肯定。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主要采用理论文本细读法。不是按照某种大而化之的诗学原理来读解吕进诗学,而是立足于吕进的诗学文本,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细致阅读和深度剖析,将吕进诗学的基本要点和闪光之处揭示出来。吕进诗学并非枯燥、呆板的理论说教,而是具有鲜活、生动的艺术趣味的诗化言说,其中既蕴藏着理论上的真知灼见,又不乏可读性和可阐释性。吕进诗学的独特性,为我们对其理论文本加以细读提供了较有典范性的材料。与此同时,吕进诗学是有体系性的诗歌理论,这意味着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论著中的理论言说具有彼此照应、相互阐述的特点,只有借助文本细读才可能将这些理论相关性烛照出来。同时,我们还坚持从历史与美学相统一的价值维度,来认识吕进诗学的合理性和创见性。吕进诗学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内在理路和外表征,无不打着特定时代的烙印,特定时代诗歌所呈现的审美面貌、面临的诗学问题、涌现出的代表性诗人与诗作等,都决定了吕进诗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决定着其理论的高度与深度,在这个角度上,历史维度是我们客观评价吕进诗学价值和意义的基本维度。然而,作为有体系性的吕进诗学,又有超越于时代的理论高度和超越于具体历史表象的概括性力度,因此,要对吕进诗学作出更准确、更科学的价值评判,我们还必须加入美学的维度,也就是在艺术一般性层面上的观照维度,从诗歌本体论的角度来认识吕进诗学更重要的意义,才可能将诗论家最为独特和不可取代的一面揭示出来。从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价值维度来挖掘吕进诗学的体系构造,概述其理论创见与学术贡献,对吕进诗学的全面阐发,才能做到准确到位,合情合理。

不言而喻,吕进诗学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地标性成果,有着极为显著的理论价值。对它的深度挖掘与系统阐释,是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无法回避的学术任务。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吕进诗学精彩而丰富的理论内涵,引发后来者更深入的探讨与阐释。

第一章 吕进诗学的理论渊源

吕进诗学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富矿，它和异域诗学、中国古典诗学以及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诗学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理论关系，倘若不分巨细地梳理吕进诗学和中外诗学的理论渊源，既殊非易事，又无必要。本章从中外诗学对话与沟通的角度，选择有代表性的诗学家、理论家及其诗学思想，探讨异域诗学、中国古典诗学和中国现代诗学对吕进诗学思想的形成和影响，以此揭示吕进为建构中国现代诗学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第一节 异域诗学的影响

吕进对异域诗学思想的吸纳和本土化改造，呈现出仿佛奥运会式的美丽景观。这里有来自日本的滨田正秀，来自印度的泰戈尔，来自美国的惠特曼、T.S.艾略特、韦勒克、沃伦等；有来自前苏联的别林斯基、马雅可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有来自德国的莱辛、歌德、康德、黑格尔等；还有来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贺拉斯等。鉴于诗的审美视点和艺术媒介是吕进诗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本节选择黑格尔和滨田正秀为例，探讨他们的美学、诗学、文艺学思想对吕进诗学的影响。

一、黑格尔的《美学》对吕进诗学的影响

对话与重建，是吕进诗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中国现代诗学，是中国诗学的现代形态，是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产物，是民族古典诗歌寻求审美现代性的表征。中西对话，古今对话，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开放气质。这种对话，既包括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对话，也包括与西方现代诗学的对话。对话的目的是重建。吕进通过与黑格尔的对话，为中国现代诗学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活力。

从《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到《中国现代诗学》，吕进现代诗学体系的黑格尔元素是清晰可见的。黑格尔的《美学》为吕进的诗学研究带来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理论高度。在1982年10月第一版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吕进引用黑格尔《美学》的文字多达五处，从诗与散文的区别到诗的弹性，都引用了黑格尔的有关论述。其中《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的第一章的第二个注释，虽不起眼，但对了解吕进诗学的发生不无帮助。吕进在介绍黑格尔的《美学》成书过程之后，重点介绍了《美学》第三卷：“原书分三卷，中译本由朱光潜译，分三卷四册（第三卷分上、下册）。黑格尔的《美学》第三卷第三章《诗》论述了诗的艺术作品与散文艺术作品的区别、诗的表现、诗的分类等，有不少启发人们深思的东西，值得爱好诗歌的读者一读。”^①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黑格尔的《美学》，1981年前后进入国内学术界，中文译本是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的《美学》为吕进诗学洞开审美之门，吕进与黑格尔的对话由此展开。

吕进诗学中关于诗与散文的区别、内视点、媒介、弹性、诗人的修养等方面都有黑格尔的影子，一定程度上说，吕进借鉴了黑格尔的美学体系和逻辑分析的方式，经由中国传统诗学对黑格尔抒情诗美学的审视和改造，实现中西诗学的对话，重建中国现代诗学的理论范式。

第一，受到黑格尔关于艺术的“物质媒介”的启发，吕进对诗的语言作了深刻阐述。

对于不同艺术的物质媒介，黑格尔有不少精彩的论述。“建筑家，雕刻家，画家和音乐家所运用的都是完全具体的感性材料（物质媒介），他们须通过这类材料来表现他们的内容”，“诗既然无须通过一种特殊物质媒介，诗的才能也就比较不大受到上述媒介条件的局限”^②。这里所说的是，诗和绘画、音乐、建筑所使用的媒介是不同的，在黑格尔看来，诗和其他艺术相比较，诗的媒介是语言，不受其他艺术的物质媒介的局限。诗人需要的是想象力、语言的修养和艺术构思方式。但黑格尔又指出：“在运用语言这一点上诗不同于造型艺术和音乐，是另用一种构思方式和表现方式的。”^③黑格

① 吕进：《什么是诗》，载《新诗的创作与鉴赏》，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② [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1—52页。

③ 同上书，第53页。

尔紧接着区分了诗的观念方式和散文的观念方式,区分了诗的语言和散文语言。吕进对诗的艺术媒介的论述,受到黑格尔的启发是可以确定的,但比黑格尔的论述要丰富得多,也要深入得多。概括来说,这种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的言说方式。诗是独特的语言方式,这是黑格尔和吕进的共同看法。黑格尔要求“把诗的文字和散文的文字以及诗运用语言的方式与散文思维中运用语言的方式区别开来”^①。散文语言的规范是精确,诗歌语言倾向于形象,因此黑格尔强调诗歌语言的特性,他指出:“诗用语言,不能像日常意识那样运用语言,必须对语言进行诗的处理,无论在词的选择和安排上还是在文字的音调上,都要有别于散文的表达方式。”^②黑格尔特别强调诗的“词的安排”,“词的安排是诗的一种最丰富的外在手段”^③。对黑格尔的这些看法,吕进是认同的,并提炼出自己的观点:“诗是语言的超常结构。它是对一般语言的语法结构和修辞法则的创造性破坏。于是,人们从用惯了、用烂了的一般语言产生的迟钝效力中得到解脱,在对语言的陌生感中敏锐自己的美感。”^④吕进的“诗是语言的超常结构”,是对诗的艺术媒介特点的总的概括,指一般语言的非一般化,它是抒情诗语言的正体。吕进的这个观点,诚然吸收了黑格尔的看法,但也吸纳了美国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更多的是对宋人魏庆之的《诗人玉屑》“诗家语”的内涵的提升,是吕进与中外诗学家、理论家广泛对话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吕进对新诗初期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观点进行了辨析,分析了它给初期新诗创作和理论建设带来的迷茫以及长期以来给新诗留下的后遗症。为此,吕进呼吁新诗的文体建设,强调诗人的文体自觉。

二是诗歌语言的音乐性。从“诗是语言的超常结构”出发,吕进阐述了诗歌语言的媒介特征即音乐性和弹性。在《美学》中,黑格尔对诗的音律进行了辩护,“说诗的音律妨碍自然流露,这是不正确的,一般来说,真

① [德]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6页。

② 同上书,第17页。

③ 同上书,第65页。

④ 吕进:《抒情诗的艺术媒介》,载《中国现代诗学》,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正有才能的诗人对于诗的感性媒介（音律）都能运用自如”^①。吕进由此出发，提升和完善了黑格尔的看法，提出诗的音乐性是诗的艺术媒介的本质特点：“内视点心灵解除了它的物质重负的视点，是富有音乐精神的视点；与此相应，音乐性也成为诗的首要媒介特征。音乐性，是诗歌语言与非诗语言的主要分界。”^②因为诗的音乐性，才有诗歌的不可转述性和抗译性。吕进对诗的音乐性的阐述是非常丰富和深刻的，认同朱光潜的“诗是具有音律的纯文学”^③的观点，指出诗的外在节奏才是诗的定位手段，才是诗的专属，并对郭沫若新诗的“裸体美人”理论、艾青的“散文美”理论提出质疑和反思。

三是诗歌语言的弹性。黑格尔对诗歌语言的弹性偶有提及，但未作探究。黑格尔在区分诗的思维方式和散文的思维方式时指出：“适合于诗的对象是精神的无限领域。它所用的语文这种弹性最大的材料（媒介）也是直接属于精神的，是最有能力掌握精神的旨趣和活动。”^④这段文字吕进在《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也引用了，说明吕进对诗歌语言的弹性理论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吕进认为：“诗歌媒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弹性。换个角度看，弹性是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又一分界。”^⑤吕进从中国诗歌的言与意、隐与显、象外意、言外旨等方面探讨了诗歌的弹性技巧。吕进从诗歌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探讨了诗歌鉴赏活动中的弹性。吕进对诗歌的弹性分为词语的弹性、句构的弹性以及由诗歌媒介创造的意象的弹性。吕进利用中国古典诗学理论资源，丰富了黑格尔弹性理论的内涵，并赋予其现代诗学品格。

第二，受到黑格尔关于诗的“内心生活”的启发，吕进提炼出诗的“内视点”学说。

在黑格尔的《美学》中，无论是诗与音乐的同构，还是诗与绘画的异质，诗总是和内心生活或者内心的情感和观照联系在一起。黑格尔认为：

① [德]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0页。

② 吕进：《抒情诗的媒介特征（上）》，载《中国现代诗学》，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③ 朱光潜：《诗与散文》，载《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1页。

④ [德]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页。

⑤ 吕进：《论诗的文体可能》，载《新诗文体学》，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